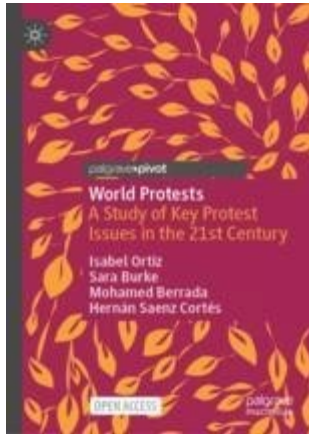


全球抗议活动： 21世纪重大抗议议题研究摘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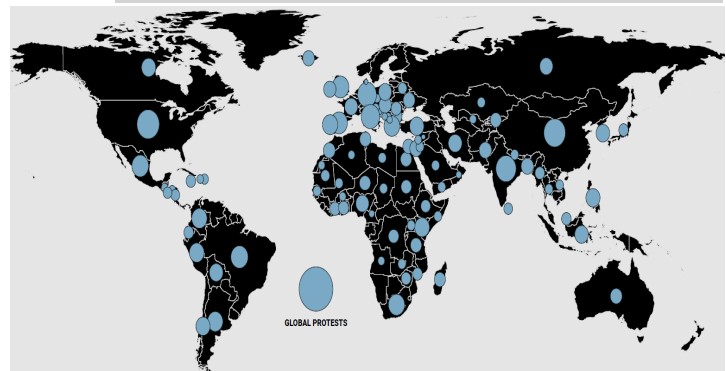
作者：Isabel Ortiz、Sara Burke、Mohamed Berrada 和 Hernán Saenz Cortés¹



《全球抗议活动：21世纪重大抗议议题研究》(Palgrave Macmillan, 2022)一书对 2006 至 2020 年间发生于 101 个国家/地区、涉及世界 93% 以上人口的 2,809 宗抗议活动进行了分析。² 重点关注：(i) 推动全球抗议活动的主要不满，(ii) 集会示威的群体，(iii) 他们采用的抗议方式，(iv) 抗议者反对的对象，(v) 达成了哪些成果，(vi) 以被捕、受伤和死亡计算的镇压，和 (vii) 女权与激进右翼抗议活动的兴起，以及“阿拉伯和拉美之春”等趋势。附录介绍了 250 种非暴力抗议方法。该调查显示，全球政治不稳定性的增加，正伴生着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性。全球各地人民的呼声都大同小异：多数与人权和国际公认的联合国发展目标不谋而合。无论抗议者的心声是有着清晰的诉求，还是只通过失望的情绪甚至暴力来表达，该研究都呼吁决策者去倾听他们的呼声并据此采取行动。

近些年来，从“阿拉伯之春”到“黄背心运动”，从“占领运动”到智利和拉美的社会起义，全球的抗议活动一直震撼人心。历史上有过几段（如 1848、1917 和 1968 年）大批民众反对现状、要求改变的时期，如今我们又遭遇了一个愤怒与不满情绪的上升期，经历了一些在世界史上声势空前浩大的抗议活动。

2006-2020 年全球抗议活动 <https://worldprotests.org/>



自 2006 年开始到 2020 年，抗议活动的总数每年都在稳步上升。我们观察到 2007-2008 年间，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抗议活动数量首见跃升。2010 年后，随着全球采取紧缩性削减/改革措施，示威活动也愈演愈烈。对政府工作的不满在 2012-2013 年达到顶峰，当时的人们抗议的是缺乏真正民主和决策者对人民责任心的缺失。抗议活动从 2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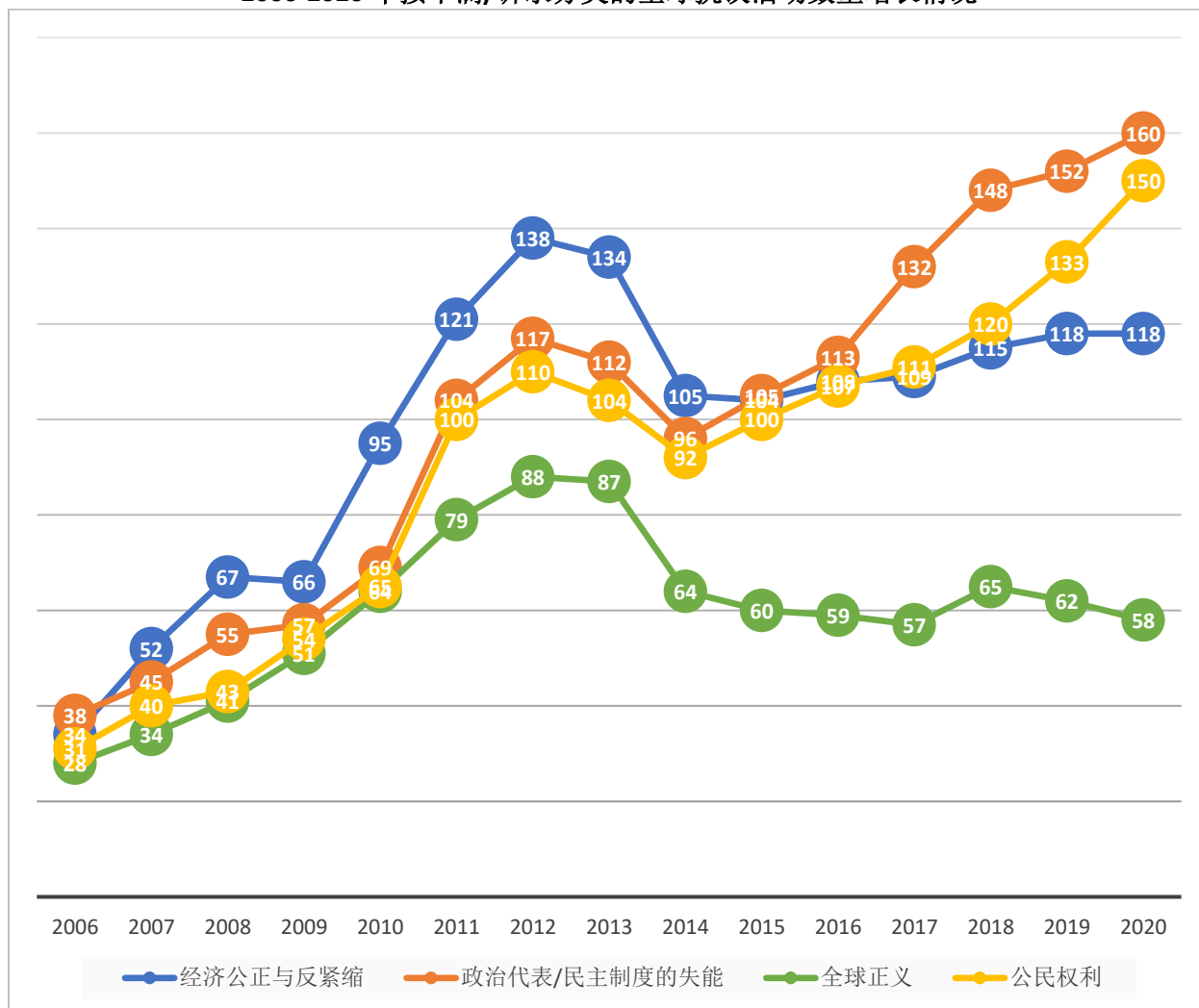
年开始再次升级——且往往会演变为对抗政治和经济体系的“普遍抗议”（针对多项议题的抗议）。全球民调均反映出对民主制度的不满和对政府的不信任。数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了

¹ Isabel Ortiz 是纽约政策对话倡议组织“全球社会正义”项目主任；Sara Burke 是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纽约办公室高级政策分析师；Mohamed Berrada 是卡萨布兰卡高级经济学家/独立顾问；而 Hernán Saenz Cortés 是布鲁塞尔国际关系分析师。

² 此调查汇编了网上 15 年来的新闻报道数据，主要分六种语言（阿拉伯语、英语、法语、德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参见同步网站：<https://worldprotests.org/>

巨大的不平等，侵蚀了中下层阶级的收入和福利，更加剧了不公正感、对民主制度弊端的失望，以及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遇阻的沮丧。2020年的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动荡。

2006-2020年按不满/诉求分类的全球抗议活动数量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Ortiz、Burke、Berrada 与 Saenz Cortes 合著，2022年：《[全球抗议活动：21世纪重大抗议议题研究](#)》

全球各地的抗议活动都在增长。研究发现，中等收入国家/地区（1,327宗事件）和高收入国家/地区（1,122起抗议）的抗议活动较低收入国家/地区（121宗事件）更为普遍。值得注意的是，2006-2020年间的全球跨区域组织抗议活动数量呈增长态势（239宗事件）。

此类抗议活动并非随机、无组织的骚乱。全球的抗议活动大都有计划且诉求明确。主要的不满和愤怒原因包括：

- **政治代表/民主制度的失能**：1,503宗抗议活动与缺乏真正民主；腐败；未获得法律制度公正；主权和爱国问题；透明度与问责制；感知到的幕后操纵政府或寡头的权力；反战或反军工复合体；公民监视；以及反社会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相关。

- **经济公正与反紧缩：**1,484 宗抗议活动与就业、工资和/或劳工条件；公共服务改革；企业影响力、放松监管与私有化；不平等；税收和财政公正；低生活标准；耕地/土地改革；燃料和能源高价；养老金改革；住房；以及食品高价相关。
- **公民权利：**1,360 宗抗议活动与民族/土著/种族权利；共有权（数字、土地、文化、空气）；集会、言论和新闻自由；妇女和女童权利；劳工权利；男女同性恋、间性人和跨性别者（LGBT）和性权利；移民权利；个人自由；囚犯权利和宗教问题相关。此类别中又增加了那些试图剥夺某一群体（如针对少数族裔）权利或拒绝平等权利的激进右翼抗议活动。
- **全球正义：**897 宗抗议活动旨在谋求环境与气候正义；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欧盟/欧洲中央银行；反对扩张主义（美国、中国）；反对自由贸易；捍卫全球公域；以及反对 20 国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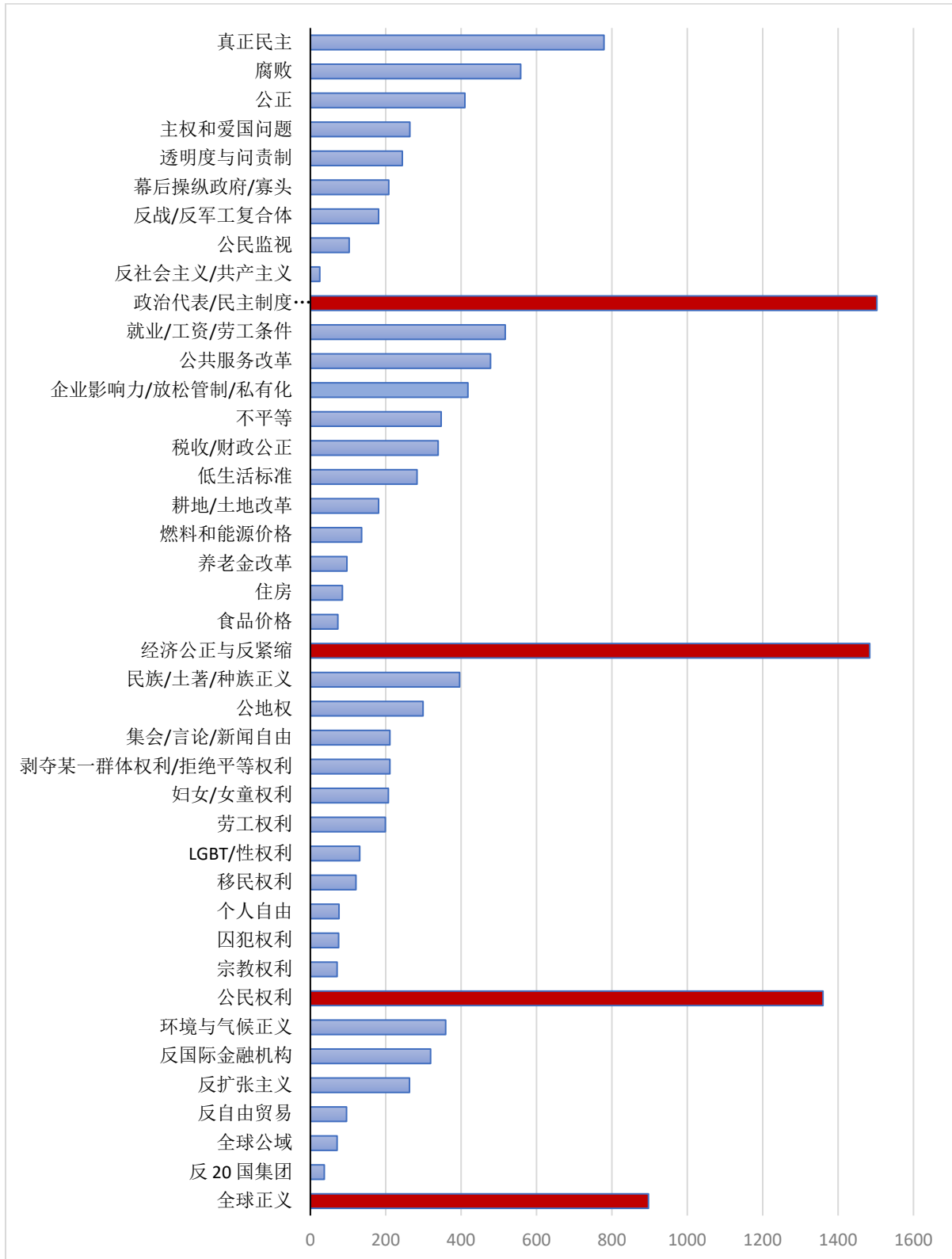
示威者群体概况显示，不仅传统意义上的抗议者（如活动家、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工会）；大多数国家/地区更有中产阶级、妇女、学生与青年、退休人员、土著人、民族和种族群体以及其他草根公民都在积极参与抗议活动。这些公民自觉并非活动家，而其抗议是因对官方程序、政党和其他与之相关的普通政客感到失望。中产阶级大量加入抗议活动揭示了一种新动态：在许多国家/地区，中产与精英阶层先前的团结已变为缺乏信任，并意识到了现行的经济体系对其不利。

不仅是抗议活动，抗议者的数量也一直在增长。据群体估算显示，至少有 52 起事件的抗议活动人数达到甚至超过 100 万人。2006-2020 年间发生了一些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其中创纪录的当属印度 2020 年反对政府农业和劳工自由化计划的大罢工，估计有 2.5 亿抗议者参与。虽说绝大多数大型抗议活动均与进步议题相关，如更多更好的就业、工资和养老金；对卫生、教育和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保护农民；气候变化应对行动；种族公正；妇女和公民权利；反对紧缩性削减、腐败和不平等；但也有一些抗议活动是由激进的右翼团体领导，如 2020 年美国乃至全球的 Qanon 抗议活动；在德国反对穆斯林、移民和难民的抗议活动；或 2013 和 2015 年巴西反对工人党的抗议活动。

抗议者采用的方法多种多样。此次研究总结出了 250 种非暴力抗议方法，载于本书附录，作为 Sharp 所著 (1973) “198 methods of nonviolent action”（《198 种非暴力行动的方法》）的补充更新。通过调查我们发现，游行与抗议集会（或示威）、封堵、罢工和占领以及网络行动主义，都属于最常见的抗议方法。2006-2020 年间还迎来了一个公民抗命/直接行动的新时代，由电脑黑客和告密者“泄露”大量政府和公司数据，以及由律师发起诉讼来推动社会和环境的进步。与大众所想不同的是，涉及暴力和破坏/抢夺的骚乱和抗议活动只占总数的 20%。尽管用者寥寥，但确实有 5% 的抗议活动有绝食和自残等极端方法的记录（如自焚，抗议者缝合自己的嘴唇）。

抗议者反对的是谁？抗议者最常用的标靶，保守来看也必然是他们自己的国家政府——即对公民负责的合法政策制定机构。有近 80% 的抗议活动主诉政府要对经济、社会和环境政策负责，要惠及全体、而非少数。抗议者进一步还反对渎职和不负责的体系/机构，比如政经体系 (30%)、企业/雇主 (23%)、欧盟/欧洲中央银行 (16%)、精英阶层 (14%)、政党/团体 (14%)、军警 (1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0% - 世界银行 1%)、金融部门 (9%)、自由贸易 (3%)、20 国集团（近 3%），以及美国 (6%) 和中国 (3%) 的扩张主义。

2006-2020 年按不满/诉求主题分类的抗议活动数量



资料来源：作者对于 2006-2020 年间媒体来源全球抗议活动的分析，参见：<https://worldprotests.org/>

抗议者达成了哪些成果？从历史角度看，抗议活动一直都是在国家和国际层面达成基本权利的一种手段。我们的调查显示，有 42% 的抗议活动导向了某种程度的可见成就（通常为部分达成）。成功很少是单独某一次抗议活动的结果，而是专注于同一不满/诉求的多年抗议活动的结果。此类结果也不一定就是消极被动的，因为许多抗议活动都涉及可能需要假以时日才能出成果的长期结构性问题；而渐进或短期的成就也可能是更全面变革的前奏。具体的诉求（如提高工资、恢复食品和燃料等补贴，或停止基础设施建设）相较以结构性变革为目标的抗议活动，成功几率更大。问题的结构性越强（如不平等、自由贸易、扩张主义）、反对对象越宽泛（如 20 国集团、金融部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军事联盟），达成的几率越低。针对政府（包括国家和地方）、宗教当局、雇主和地方企业的抗议活动成功率更高。

此研究中分析的抗议事件有 60% 以上有镇压记录，形式则为国家组织的暴力造成的被捕、受伤和死亡。所报告的镇压方法还包括催泪瓦斯、监视、报复性法律制裁、骚扰、诉讼、被迫失踪、被迫成为难民、枪击、酷刑、互联网限制、驱逐和递解出境。据媒体报道，2006-2020 年间，在香港（中国）、埃及、法国、伊朗、英国、俄罗斯、苏丹、智利、马来西亚、墨西哥、美国、加拿大和喀麦隆发生的抗议活动中，被捕人数最多，每次抗议活动的被捕人数为 1,000 至 10,000 人。造成最多报道受伤人数的抗议活动是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以及埃及、智利、泰国、厄瓜多尔、黎巴嫩、阿尔及利亚、匈牙利和印度尼西亚。就死亡人数而言，最严重的国家/地区当属吉尔吉斯斯坦、埃及、巴勒斯坦被占领土、肯尼亚、伊朗、埃塞俄比亚和苏丹。必须指出的是，虽然被捕和监视与政府主导的镇压有直接联系，但也有为数众多的伤亡可能是不同群体之间的暴力冲突所造成。

近年来，世界各地都出现了从反专制的左翼民粹主义抗议活动向普遍专制的极右翼民粹主义抗议活动的转变。激进右翼抗议活动有一些共同特征，包括谴责政治制度，指控其腐败，并暗示“幕后操纵国家”的黑暗势力正在密谋剥夺中产阶级的经济安全。此即引发“Qanon 运动”、袭击美国国会大厦，以及涉及匈牙利、波兰、英国和土耳其的“幕后欧洲/外国势力”阴谋的大致情况。虽说此类抗议活动背后的怒火可能是对长久以来无法满足人民经济需求的政治制度的理性反应，但这股民粹主义浪潮最令人不安的特点在于，许多抗议者不仅要求自身权利，还要求剥夺其所认为威胁其就业或地位之群体的权利和平等地位，例如移民（如德国“欧洲爱国者反对西方伊斯兰化”（PEGIDA）；英国的“脱离欧盟”运动；以及法国、爱尔兰和加拿大为数众多的“黄背心”抗议活动）。还有包括呼吁个人自由（持枪、不戴口罩、不被隔离）、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宣扬传统价值观在内的其他特征。例如莫迪执政期印度的“护牛联队”，埃尔多安时期土耳其的穆斯林民族主义，以及巴西国会中旨在推翻民选工人党的“子弹、圣经和牛肉”派都属于此种情况。许多国内外团体还在社交媒体上以错误和虚假信息为武器，煽动敌意、削弱民主制度以彰其自身利益。

因此，2006-2020 年间被政治派别利用来夺权的抗议活动，往往都鼓励暴力行为。为抵抗激进的右翼民粹主义，社会需要揭露极右翼政治的矛盾，让人们自己去判断。社会还需要推行公平的经济政策，减少不平等的同时，为所有人提供机会和更高的生活标准。两极分化、不平等和虚假信息，以及独裁民族主义运动的趋势，只有重拳出击才能得以扭转。

我们的调查证实，中高收入国家/地区的高度不平等与抗议活动存在正相关；而低收入国家/地区不适用此论断。为更深入探讨此议题，我们研究了抗议活动与不平等基尼系数（扣除税收和福利）增加/减少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不平等增加的国家/地区抗议活动更多，反之，不平等正在减少的国家/地区则抗议活动减少。数据分析还显示，认为政府为少数人服务的人数百分比与每个国家/地区的抗议活动数量之间存在关联。

还有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国家和全球层面的妇女和女童权利抗议活动的重要性愈加凸显。全球性的 #MeToo 运动 (自 2017 年以来) 公开抨击了工作场所的性骚扰和不平等的薪酬和机会；智利 (自 2018 年以来) 和各西班牙语国家的 #NiUnaMas；或者更多地方性的抗议活动，如沙特阿拉伯允许妇女投票和开车 (2006-2017) 以及尼日利亚女孩被绑架后的 #BringBackOurGirls (2014)，都是近期争取妇女权利的抗议活动的例证。

在国家和全球层面，从就业、公共服务和社会保护到善治、减少腐败、公平税收和公民权利，为解决本书所述不满情形而需要的一系列政策，几乎涵盖公共政策的每一领域。

政府需要倾听抗议者的心声。大多数诉求均与人权和国际公认的联合国发展目标不谋而合。领导者的决策者若不能倾听并根据抗议者的主要诉求采取相应措施，则只能招致更大动荡。

参考资料：

World Protests: A Study of Key Protest Issues in the 21st Century

作者：Ortiz, I.、Burke, S.、Berrada, M.、Saenz Cortés, H.

出版商：Palgrave Macmillan (2022)

ISBN 978-3-030-88513-7 / DOI 10.1007/978-3-030-88513-7

本书开放获取 - 下载链接：<https://link.springer.com/book/10.1007/978-3-030-88513-7>

访问同步网站：<https://worldprotests.org/>